

## 學術報導

# 日本東京有關中國近代史資料的收藏及

李毓澍

## 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的概況

日本是一個學術文化相當發達的國家，由於國民普遍對知識的愛好和尊重，促進出版事業的發達和圖書館的設置；史蹟的保藏，史料文獻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也聯帶受重視；加以近七、八十年日本本土幾未曾直接發生遭受戰亂，中日兩國文字上的淵源和地理上的鄰近，以及明治維新起，為圖向中國大陸發展，所形成朝野研究中國問題的風氣。有上舉這許多因素，遂使日本今日所保存下有關於研究中國問題的資料，數量之豐，利用之便，都是值得注意的。

作者五年前以福特計劃的資助，旅日一年，從事有關中日外交關係的研究，其後對日本方面有關中國近代史資料之收藏、整理、研究等成績，即經常注意蒐集。復得林明德先生惠賜補充資料，以就正作者所見所聞，爰分別簡略介紹如次：

### 第一、東洋文庫

#### (一) 莫禮遜文庫的讓渡

東洋文庫是民國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由日本財閥岩崎久彌出款三萬五千英鎊，收購莫禮遜 George E. Mor-

rison 的莫禮遜文庫爲基礎發展而成。

莫禮遜是澳洲人，一八九三年來華，曾數度旅行中國各地。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起以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特派員常駐北京。最初莫氏係私人對東方學問研究而從事收集，歷經二十餘年的苦心經營，形成頗具規模的亞細亞圖書館（The Asiatic Library），日人稱之謂莫禮遜文庫，地點在北京東城王府井大街莫氏私宅。因莫氏收藏博且精，凡歐美學者來華從事研究工作，莫不重視此一私人收藏。先後經倫敦雜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學報等推介，莫禮遜文庫遂著名於世界。

當時收藏圖書達二萬四千多冊，地圖版畫一千餘張，就語文分有英、法、德、俄、荷、意、西、葡、拉丁、希臘等各種，就地區分有中國本部，朝鮮、滿蒙、新疆、西藏、西伯利亞、中亞細亞、中南半島、南洋羣島、菲賓羣島等。因為莫氏是學醫的，後來又以新聞記者及北京政府顧問等爲職業。所收藏的部門，除偏重近代政治、外交、法制、經濟外，對文藝、考古、美術、宗教、及動植物、礦物等著述，亦頗多收集。此二萬多冊圖書，不僅收藏富而且選擇精。

其中最爲人所樂道的珍本，如：

- (一)馬可孛羅遊記，從一四八五年版本起，凡收藏古本有四十餘種。
- (二)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在華的研究及佈道的報告多種，收藏之富，莫氏頗爲自豪。
- (三)有關日俄戰爭當時各國出版圖書，凡五百餘種。

四一百十多種定期刊物，共集有六千冊。

五地圖圖版收藏有十六世紀地理發現時的東方輿圖，鴉片戰爭期間照片等。

莫氏有意將此私人收藏出讓時，美國哈佛、耶魯各大學皆曾接洽，情願出資承購。但莫氏以此項資料既為研究東方學問而收集，極願售讓予中國學術團體，最少亦須永保藏於東方，拒絕美國方面的接洽。此時日本井上準之助、小田切萬壽之助始聞訊接洽，終由岩崎氏出資，聘東大校長上田萬年、白鳥庫吉承購，並由石田幹之助負全責，於民國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定約即設法裝運，得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全力支持交涉，九月運抵橫濱，至是此馳名世界的莫禮遜文庫遂落入日本之手。

## (二) 東洋文庫的成立與收藏

莫氏出售此項收藏時，曾約定三事：一、此項收藏不得分散，且應繼續收集並擴充之，二、須永久保藏於東亞，三、對於從事研究之學人無分畛域應予以便利。此三項約定，東洋文庫自創設迄今，可謂信守不渝。

東洋文庫現址，座落東京駒込上富士前町，係一九二三年東京大地震後所建。翌年竣工，同時組設財團法人，聘定評議員管理財團基金，設庫長負文庫行政總責。首任評議會理事長即林權助，庫長即白鳥庫吉。

正式開館之初，除購運到日的莫氏藏書外，新增日文圖書三萬五千冊，中文圖書二萬冊，其中包括各省縣地方志二千八百冊。又接洽將歐洲各大圖書所藏耶穌會刊印珍本圖書，斯坦因 Stein 與伯希和 Pilot 在中國西部所發現史料等，照相製副。

嗣後按年增添擴充，據其一九三八年所印各種目錄統計，共有中日文圖書十六萬四千冊，西文圖書七萬八千冊。戰時戰後限於實際情況，圖書的增添一度停滯。現改為日本國會圖書館支館，由政府撥出經費維持擴充。經六、七年來所藏圖書當已超過四十萬冊。現任庫長為辻直四郎（日本學士院會員）。

東洋文庫成立後，陸續增添的特別收藏，又有：

(一) 韓文圖書：凡一千三百三十部，共七千一百二十七冊，此項圖書以日本駐韓公使館通譯官前間恭作所收藏的「在山樓本」最著名。

(二) 滿蒙藏文圖書：收藏滿文圖書最重要者為「鑲紅旗檔」，起自雍正年間迄於宣統，共二千四百二十件。蒙文藏有甘珠爾經一部共一百零八套。宗喀巴法句集一部二〇套，零星佛經二百二十餘種。藏文收藏有甘珠爾經一部一百零三套，丹珠爾經一部二百二十五套。

(三) 安南文藏書：此項圖書係收藏前駐河內領事永田安吉氏的藏書，共一百零三部，六九五冊。

東洋文庫除本身收藏外，尚有若干特別文庫，係各大收藏家將其藏書贈與或寄附於文庫的，書目皆分別編製，這中間有所謂「三大文庫」。

(一) 岩崎文庫：此為岩崎氏家藏捐入文庫，計有五千二百九十餘種，二萬三千七百多冊。內中有「雲村文庫」係岩崎收藏和田惟三郎的藏書，以善本多著名。岩崎又先後收購廣橋伯爵，小野蘭山及有賀長雄各氏收藏，以鈔本多，為一特色。近衛家珍藏「御堂關白記」，西園寺家所藏「管見記」，為治日本史稀世珍本，岩崎文庫都藏有照相副製本。

(二) 小田切文庫：岩崎文庫為治日本史最被重視的收藏，小田切文庫則以收藏中國圖書為特色。小田切氏任橫濱正金銀行駐北京代表，經年常駐北京，陸續近十五、六年的收集，此一文庫有中文書一千二百五十餘部，凡一萬七千六百多冊，日文書四百五十四部，凡一千八百三十冊。

(三) 藤田文庫：係文學博士藤田豐八郎氏藏書，死後捐贈東洋文庫。收藏中日文圖書一千七百六十餘部，凡

二萬一千六百多冊。藤田曾任日據時期臺北帝大文法部長，臺北帝大要求分贈若干圖書，因藤田所藏西文圖書東洋文庫已有者居多，遂全部移贈臺北帝大，現收藏於臺灣大學圖書館中。

除三大文庫以外，如曾任理事長井上準之助，理事上田萬年等，亦將所藏圖書捐贈東洋文庫，井上以收藏經濟財政金融有關雜誌刊物著名，凡積有一千六百多部近五千冊。上田博士收藏有早期在日本佈教教士函件，多達一五九冊，又有最早測繪庫頁島地圖等，最為珍貴。

至於特別與近代中國有關的資料，尚有渡邊哲信捐贈的全套「順天時報」及松村太郎捐贈的「松村文庫」，須略予說明。渡邊哲信為順天時報社長，此報係在北京發行的中文報紙，創刊於光緒三十年，結束於民國十九年，全部分裝二五〇冊，迄今極少短缺。又有在天津發行英文「華北正報」*The North China Standard* 創刊於民國八年，終刊於民國十九年，全部分裝一百二十四冊。

松村太郎本為順天時報記者，後兼任「每日新聞」北京採訪員，幾半生旅居於京津滬一帶。此人為有心人，專收集清末民初各種裨官野史掌故等書，直到中日戰爭爆發為止。所有集約八千種之多，均移贈東洋文庫，此一書目尚未印行。

### (三) 東洋文庫圖書的分類與編目

東洋文庫的圖書分類是自成系統，中日西文各不相同。日文圖書分十八類，計有：總載、神祇、宗教、哲學、教育、文學、藝術、歷史、地誌、政治法律、經濟財政、理工、醫學、兵事、產業、普通別置本、特別別置本及逐次刊行書。如總載類又分日本、中國、東洋、西洋四目。中國目又分書誌、書目、叢書、事彙、類書、隨筆、雜書。

等各細目。

其歷史一類，計分爲滿洲史及中國史等五目，並列舉兩目各細目於次：

1 滿洲史：總說年表、雜類、通史、時代史、地方史、記錄、史料、考古、傳記等九細目。

2 中國史：總說目錄、雜類、年表、通史、太古至元史、明史、清史、民國史、地方史、風俗、記錄、史料、古文書、史蹟、考古、歷史地圖、傳記、辭書、年譜譜系、叢傳、各傳等二十一細目。

〔註：日人分「滿洲史」與「中國史」原係別有用心的，如今仍沿襲前舊制，餘從略。〕

「類」用羅馬數字冠頭（I II III IV ……），「目」用阿拉伯數字代表，細目以英文字母代表，然後按書給一編號，每書號皆合四種號碼而成。

中文圖書分經、史、子、集及叢書五類，另外朝鮮本，滿蒙藏文本及安南本皆附於中文圖書，普通別置本，特別別置本及逐次刊行書三類與前述日文圖書相同。惟日人雖分圖書爲經史子集各類，但標準與我人稍有差異，子類的出入尤大。其編目代號方法與日文圖書同。如：

魏 源：古詩微 I —— 4 —— A —— 14。

張 勳：松壽老人自述 II —— 10 —— C —— 14。

梁章鉅：退庵隨筆 III —— 11 —— B —— 52。

徐繼畲：退密齋文集 IV —— 2 —— F —— 356。

伍崇耀：粵雅堂叢 V —— 5 —— B —— 90。

西文圖書分爲十八類，計一般參考書、亞細亞遠東及太平洋、中國本部、朝鮮、滿蒙、西伯利亞庫頁島附、

西藏、中亞細亞、南洋羣島、菲律賓、中南半島及馬來亞、印度、波斯、阿拉伯回教附、巴比倫敍里亞及加提、西部亞細亞及埃及、日本臺灣琉球及定期刊物等，係以地域分類，大體仍保持莫氏藏書的舊規。

在保管上又分珍本、絕版書、大形本、散裝捲軸或小冊子書，古圖版等，借閱時手續上須特別註明，但因該文庫藏書原則上均不外借，限在庫內閱覽，對學人利用反無甚不便。

就中文圖書版本而言，宋元刊本頗有收藏。如晉書、魏書藏有宋刊本，隋書、貞觀政要藏有元刊本。又就中文雜誌而言，起自光緒二十九年，止於民國二十九年，共收藏有二百七十種之多，其收藏之富，舉此一二，餘可概見。

#### （四）近代中國研究會的設置與工作

東洋文庫自設立起，即聘有從事研究的專家，並經常設置講座，邀請著名學者作專題講述，集合專門研究東洋史的教授學者聽講討論。如白鳥庫吉講「漢魏時代的西域」，和田清講「明初女真社會的變遷」，原田淑人講「漢魏人的服飾」，津田左右吉講「道家的思想及其發展」，石田幹之助講「關於蒙古史最近的發現」等。近來有關「宋史」研究，仍有定期演講會或談話會舉行。

東洋文庫出版有論叢、叢刊等。論叢是發表研究成果，叢刊係印製或複刊若干絕版古籍，皆極受中外學術界的重視。論叢迄今出版約有五十餘種。又為培植後進起見，特設有研究生，係前任理事長白鳥庫吉、桐鳥像一等氏捐基金設置，選拔優秀好學青年予以培植。如前幾年來臺研究滿洲老檔的青年學人岡田英弘，通曉滿蒙藏語文，即曾為東洋文庫研究生。

至於有關近代中國問題的研究，則應特別介紹附設於東洋文庫的「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

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係一九五三年設立，專從事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此會的創設，固由於日本若干學人感覺有特別注重研究的需要，受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趨向的高潮的影響，當亦為主要原因之一。研究會設立之初，推舉和田清氏為會長，（和氏逝世後，未選），另選山本達郎、市古宙三及牧野巽為委員。後又增選村松祐次等為委員。但實際由市古宙三氏負責主持。

此會設立後即獲得美國洛克斐爾基金的支持，訂有五年計劃，其研究工作分二部份，一為選派學人出國考察，一為從事專題研究。其專題研究工作，第一期為二年計劃，參加者計二十人。其專題已完成者如次：

市古宙三（御茶女子大學教授）

清末的革命運動（由中日戰爭到辛亥革命）

衛藤瀋吉（東京大學教授）

中國最初之共產政權——海陸豐蘇維埃史已發表

赫德研究已發表

神田信夫（明治大學教授）

清末的官制改革

小野川秀美（京都大學教授）

康有為研究已發表

村松祐次（一橋大學教授）

義和團之亂原因經過及結局

中山八郎（大阪大學教授）

鮑超與霆軍（平定太平軍之亂止）已發表

中國舊式軍隊的解體與近代軍隊的形成

中田信吉（日本國會圖書館工作）

同治年間陝甘的回亂

中國回民軍閥的盛衰

佐伯有一（原任東京都立大學教授現任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勞工運動

波多野善大（原任名古屋大學教授現任京都大學教授）

中國農村的實政研究

佐佐木正哉（原任東洋文庫工作現爲明治大學教授）

近代中國金融資本的研究

坂野正高（東京都立大學教授現任東京大學教授）

北京對俄交涉機構的演變（一八五八——一八六〇）

清末政治機構所受西方的影響

山本澄子（基督教大學教授）

二十世紀上半期新教在華傳教史

中國基督教教會的自立運動已發表

日本東京有關中國近代史資料的收藏及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的概況

鈴木中正（愛知大學教授）

清末的財政與官僚的政策

已發表

重田德（東京大學副教授）

地丁併徵的歷史意義

多賀秋五郎（中央大學教授）

近代中國族塾之性格

已發表

近代宗譜的傾向與宗族崩潰的過程

田中正俊（橫濱市立大學教授現任東京大學副教授）

一九二七年上海爲中心的中國勞工運動

矢澤利彥（埼玉大學教授）

一八九〇年代教案的研究（改名「長江流域教案之研究」）

或已發表

山根幸夫（東洋文庫工作）

中國地方自治的發展

山本達郎（東京大學教授）

安南的社會及其變遷

第二期又增加東京大學野村浩一，北海道大學小山正明及京都大學里井彥七郎三氏，研究期限爲三年。其先後完成的研究成果，出版有「近代中國研究」，陸續刊登，今已出版至第七輯。

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除個人從事專題研究外，又有討論會每月舉行兩次，第一期討論題目的範圍，自中日甲午

### 戰爭至五四運動（一八九五——一九一九）。

洛氏基金資助結束後，又續得福特基金會及亞洲協會的資助，除專題研究及出國考察繼續外，並大量添購中日西文圖書及有關報刊，出版「彙報」刊布學術研究消息。據其已編印發行的圖書目錄，計西文圖書增添一千五百餘種，日文圖書添約七千種，中文圖書編目尚未竣事，現按期分登於其「彙報」中。

此外尚須補充者，近代中國研究會委員數年來從事研究資料目錄的編輯與印行。如衛藤藩吉曾編有「東洋文庫及日本重要大學所藏英國藍皮書目錄」。市古宙三編有「東方雜誌目錄」，「萬國公報、民報、江蘇、浙江潮及湖北學生界各雜誌論說目錄」，「國史館館刊、中國農民、新青年各雜誌論說及記事目錄」，又編印「近百年中國名人關係圖書目錄」。佐佐木正哉編有「清代經世文編總目及索引」，「左宗棠、張之洞、薛福成、張謇四氏奏議目錄」、及「盛宣懷、袁世凱奏議目錄」。此種工具書目的編纂，對從事研究工作的中外學人，裨益非淺。

惟近年來因受日本部份歷史學者之攻擊，近代中國研究會已放棄接受美方資助，而規模則並未縮小，一切研究活動均自謀發展。集體工作的重點已由所謂「特定研究」改為各種資料之整理與編輯。

## 第二、日本外務省的外交文獻

日本外務省的外交文獻，從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雖陸續有計劃列印日本外交文書，但未經列印的檔案，允許國際學人閱覽，從事研究，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

### (一) 檔案的收藏和編號

外務省檔案的編號，是分「門」，「門」下分「類」，「類」下分「項」，「項」下分「號」，「號」下分「目」，對照美國國會圖書館所印行的日本外務省檔案目錄 *Checklist of 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868-1940)*，這目錄上的號碼，就是將檔案上的門類項號目合併在一起編排的。

就筆者所用過外交文書編纂室所製的檔案目錄，「大正期間中日關係記錄目錄」是大正十五年間（一九二六），與中國有關的外交檔案編目，係打字複印共有二百九十一頁的一冊。

對照大正年間中日有關的外交文獻，經過美國攝製顯微縮片 Microfilm 的，只不過全部文獻的十分之六。十四的文獻是當時漏照，或盟總發還日本以後陸續整理發現的。如作者看過的日本要求在華南（閩、贛、鄂、浙）鐵路敷設權（日本謂南支鐵道案），民國二、三、四年革命黨人旅日案（日本謂「亡命者」案）及民國四、五年各地排斥日貨案等，都有未經攝製縮片的部份。加以每種檔案又可能有兩種或數種不同的本子，互有短長，將此項名稱上重複而實有不同的文獻合併計算的話，則未曾攝製縮片的百分比，一定還會大於百分之四十。

再對照明治年間已刊布的外交文書，與實際收藏的檔案相比較，估計選擇纂輯刊印的文件，最多只佔檔案的之一、三。雖然外交上重要案件和交涉過程中主要的文獻，或不至遺漏，但選擇史料的取捨之間，日本與中國有立場的不同，鑑別史料的重要性，也因研究者所持的觀點和分析問題不同的角度而有差異，因此，就是研究明治年間中日外交問題，利用此項未曾刊布的資料，仍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外務省開放其戰前的外交文獻，允許國際學人閱覽，與盟軍佔領並將檔案攝製縮片一事，似不無關係。舊

金山和約簽字，美國才將此項檔案發還，在發還以前，連日本學人也無法利用此項外交資料，外務省白井勝美氏發憤以兩年時間，編成「日本外交年表暨主要文書」兩厚冊，即為供給日本學者研究之用而編纂的，這部書到今天還有參考的價值。

外務省檔案的保管，屬於文書課的工作，設有記錄班，專司典藏出納事宜。就作者所見到的文卷而言，對於過去檔案的管理，不無失於零亂之感。有的案卷標籤題目則與實際內容不甚符合，有的案卷常滲入若干並無直接關係的文件。有的案卷就整個交涉過程來看，常感有不銜接處，據說是清理舊庫才被發現的散失案卷。

本來檔案是行政事務處理過程中，積年累月而保留下的，分卷標籤及交涉案件經過長時期的演變，這種失諸零亂的情事也正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但另外還有下列兩種原因，對此當亦不無影響：第一、外務省的檔案保管，過去有大庫小庫之分，大庫所收藏的是一般性的文卷，小庫所藏的文卷，課長以上或特經指定的人員才有資格借調。在作者所見到的案卷中，也發現有一些文件只標題「年月日」「事由」，註明「本件由課長密存」字樣，這是當年中國課長所掌握對華最機密的文件。據聞這類文件，有的事過境遷或人事易動，也會歸入普通案卷的，但也有另行編卷列存小庫，交涉案卷中常感到有不銜接處，當與此有關。

第二、外務省的檔案，過去即有部份焚失。最近在一本書上看到，主編「走向太平洋戰爭之道」的角田順氏所說，在第二次大戰將結束前，外務省曾經大量燒燬若干檔案。檔案保管的錯亂或散失，到今天尚有陸續清理發現的文件，與此舉也不無相當關係。

## (二) 檔案有幾種記錄的舉例

外務省的檔案，就作者所見到關於「二十一條要求」部份的文獻來分析，就有四種不同的本子。

第一種本子是「松本記錄」。

這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所編日本外交檔案縮片目錄的一種本子，是松本忠雄個人爲研究此一問題時，由其妻女照檔案分別鈔寫的。松本忠雄是昭和初年外務省次官，也是研究日本外交史極負盛名的學者，這種本子是在盟總佔領前就列入外交檔案。雖是鈔本，其真實性是絲毫無可置疑，只是鈔件遺漏訛錯太多。

第二種本子外務省稱爲「小池記錄」。

這份記錄是照原件複印的。小池是小池張造，宣統年間曾任駐奉天總領事，是安奉鐵路交涉的要角，中日二十一條交涉時擔任外務省政務局長職務。政務局長是負責執行外交政策的，在大臣以下地位最重要。二十一條要求最後的定稿，即由此人親手擬訂。這份記錄即是 he 所保存下來的。

照所見檔案中批註的處理程序，外務省當時收到重要文電，由文書課長或電信課長在原件上批註分送何人閱覽，然後將文件複印若干份，日本稱爲蒟蒻版（こんにやくばん）。除大臣政務局長等外，常見到有下列字樣：

「伏總各老」或

「伏總各老寺參軍」

據前外交文書編纂室主任栗原健先生指教，伏是伏見宮，總是總理大臣，各是內閣各大臣，老是各元老，寺是當時朝鮮總督寺內正毅，參是參謀部，軍是軍令部。小池張造有一份複印本，並且用筆批註圈點過，遺留在他的家屬手

裡。現在外務省小池記錄，是根據原件複製。據云全檔是由第六冊開始，即民國四年二月廿六日第三次會談的電報起，直到是年五月底全案交涉結束止，近年才由小池家屬提供。

因為外務省處理文電程序如此，他種案件自然也可能有類似「小池記錄」的本子留存下來。

第三種本子是所謂「編纂本」：

這是打字複印的本子，據聞當初外務省本有刊印某部份外交文書的計劃，曾將若干文獻按時編纂起來，然後打字複印。如二十一條要求的交涉，有大部份文獻收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卷內。因為有些文獻現以散失或焚燬，在這種編纂本內竟無意中保留下一份副本。現在外務省編纂大正初年外交文書，也須借重這種本子選補。

還有，計劃出版一種文獻的編纂時，對文件的選擇受時代的影響。二次大戰前後，日本人自身的觀點已有了很大的轉變。研究當時的問題，對照這種編纂本就更有意義。至於字跡清楚，排比井然，閱讀方便，尙其餘事。

第四種本子才是真正原始檔案。

這是最珍貴的文獻，也是最亂和最難讀的。歸卷原很粗疏，標題和內容不盡符合，紙張大小不一，私人函件更甚。書法也是草體居多。發文的原稿添添改改，收文批批註註，越是重要的文件，就越常遇到這種現象。譬如二十一條要求有一本雜卷，就收藏着最初起草三種原要求的底案，雖然這些底案都是作廢了的，可是要研究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是如何形成的，正可從三易其稿的批註添改中，看出若干的真相。

### (三) 外交文書的刊布與研究情形

日本外務省出版的情形，過去有「外務省年鑑」的編印，不對外發行，但也有按年度發表的「外務省公表集」

及針對某一事件公布的若干外交文獻。又有若干撰寫的著作，專印來供內部或駐外使領館參考。譬如「日露外交史」全三冊共九百多頁，「日蘇外交史」一冊約五百頁，當初都只印二百本。日露外交史從西伯利亞勘路起，直寫到日俄第四次密約止，日蘇外交史是從俄國革命寫起，接續前書，都是外務省約請專家根據所看到最原始資料撰寫的。對中國關係來說，是極該重視的材料。但現在外務省只保存日露外交史兩三部，日蘇外交史因需用關係，據聞最近又重印過一次，也只保存十多部，這一類書籍過去是極少流傳到外面的。

在日本從事外交史研究的，就作者所知最少有三個學術團體，直接或間接都受外務省的協助。利用外交檔案從事外交上各種問題的研討，研究的成果自然也提供外交當局的參考。

一個是神川彥松所領導的國際政治學會，現由田中直吉實際主持，並另設國際政治研究所，出版有「外交史研究季刊」。這個學會和研究所很受外務省文書課的協助。第二是由現任最高法院橫田喜三郎所領導的國際法外交學會，出版定期刊物叫「國際法研究」，是受外務省條約局的支持。第三是植田捷雄所主持的亞細亞學會，是受亞細亞局（政務局自大正九年分設為亞細亞局與歐美局）的支持，出版有「亞細亞研究」。

外務省圖書館收藏相當豐富，滿鐵的一部份調查資料也庋藏於此。日本外交人員進修研究的風氣很高，在過去若干權威的外交史學者，如齋藤良衛、信夫淳平、松本忠雄等，都是外交官出身。迄今仍可看到那種公餘潛心於圖書館鑽研的傳統風氣，令人無限感慨。

日本外交文書的編纂，是屬於文書課的工作之一。分設有外交文書編纂室，延用專人從事編纂工作，也聘請學者如神川彥松、植田捷雄等擔任編纂的顧問。編纂的方法過去曾分年分事由專人擔任。以後改進為分組編纂，組的劃分和名稱，視各年文獻主要內容而異。如編輯大正二年外交文書，係分一般交涉、中日交涉及移民問題三組。編

纂大正三年的，則改分爲中國班、歐戰班及「本卷班」。所謂「本卷班」，即負責中日交涉與歐戰以外的一切文獻編纂事宜。

就出版情況來說，明治朝外交文書已全部編印出來，每年分一卷，共四十五卷。每卷又分爲若干分冊。某一專卷如特別編輯，仍冠以依年份所定的卷號，列爲第若干卷別冊。如我國辛亥革命，日本稱作「清國事件」，編列爲明治第四十四卷第四十五卷的別冊。

總計明治朝外交文書出版本卷六十三冊，別冊九冊，共有七十二冊，係按年份編卷。又有如通商條約關係，條約改正關係、小村外交史等，無法按年份分卷，編爲別卷的共十七冊。最近又出版「追補」二冊，第一卷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兩個綜合報告，（一）日清交涉提要，（二）露獨佛三國干涉概要。第二卷則刊布改正條約交涉各項西文會議錄。統計共出版九十一冊，都七萬三千餘頁。

目前繼續編印大正年間外交文書，第一部份即大正二年，（大正元年四個月併入明治四十五卷內）一九六五年出版計分三冊，大正三年部份亦分三冊，大正四年、五年兩部份仍各三冊，皆已出齊。現已出至大正六年第二冊。  
外務省座落在霞關，故有又霞關會的組織，本係外交界退休人士聚敘處所。外務省編印若干辭典一類參考書籍，多以霞關會名義出版。

#### （四）有關中國內政的史料

日本外交檔案，對於研究近代中國政治史經濟史等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過去的日本，本是處心積慮謀我，日本的外交也以對華外交爲中心，換言之，就是以侵略中國爲唯一的目的。其對於英美俄法等國的外交活動

，只是爲侵略中國布署有利的條件和環境。

在這樣的政策下，其外交文獻中，遂包含了極大份量有關中國內政的資料。第一是駐華各地使領館直接間接的報告，這又分定期的工作報告和蒐集的情報兩種。日本派華的外交人員，書記生以上即可經由使領館向外務省提出報告或意見，副領事以上都可直接向外務省報告。定期的情報，更是專門分析當時當地中國內政的資料。又因爲日本使領館人員分佈的地區廣，接觸的深，就史料本身來說，這些報告所保存下有關中國內政的資料，是極有參考價值的。

第二、若干散布在華的情報人員、商業金融分支機構所蒐集的報告資料，由參謀部或陸海兩省，滿鐵株式會社三井物產會社，日清輪船公司及橫濱正金銀行等，分送給外務省參考的副本。這些資料在原機構或早已散失，所包括的範圍極廣泛，資料很有價值，且幾乎全部是不會被挑選刊布的。

第三、外務省直接收受各方面的建議函件，這裏面有元老、陸海軍當局，財閥系統和浪人集團，還有所謂「在華居留民」各式各樣的社團組織。這些建議的函件，自然也包括了極多中國當時的史料。

日本過去既採取謀我的策略，故無時不設法在我國製造不安分裂和混亂。譬如北京政府時代軍閥割據的一段歷史，其勾結各地軍閥，結納政治上失意政客，出售或接濟軍火，利用金錢勾煽收買等等，從這些領事或陸參人員的報告中，將更可進一步明瞭民初若干次內戰的真相。

二次大戰結束已經二十多年了，看以前日本外交檔案，尤其是一個中國人的感覺，正因爲那時候日本所施於中國的極酷，而爲禍於中國的特深，自然都是一幕幕慘痛的回憶。但是就研究中日的外交關係或中國內政來說，外務省的檔案資料，則是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寶藏。

### 第三、東京附近有關資料的收藏及日本研究中日外交史的趨向

日本各大學研究所及圖書館所收藏的資料，有連絡會議，定名爲「東洋學文獻連絡會」，儘量互相供應給研究需用學者便利。這是一種值得效法的合作辦法，一九六五年七月一次會議中（在東洋文化研究所舉行），並曾指出過去日本東洋史學研究的錯誤，謂「明治以降，日本東洋史研究的發展，實與日本帝國主義相表裏。換言之，即與侵略主義緊密結合。今後應站在亞洲各民族解放自覺的觀點上，重新改弦更張」，這是很值稱道的。

#### （二）東京附近有關近代中國資料的收藏

上述東洋文庫及外務省外交文書之外，東京附近有關中日近代外交關係資料的收藏，尚有七處應簡略予以介紹：

第一、屬於日本國會圖書館的，有憲政史資料室，亞細亞資料室和幣原平和會資料室三處。

（一）憲政史資料室：這是編纂日本憲政史時所收集的資料，有報紙雜誌、演說稿及日記鈔本等。戰後並新收集有明治時代重要人物伊藤博文、伊東巳代治、井上毅、松方正義、樺山資紀、大山巖、牧野伸顯等所保留的書翰及公私文書。山縣有朋的資料，也攝存全套顯微縮片。

（二）亞細亞資料室：這也是日本國會圖書館特別部份之一，專收藏研究亞洲有關問題的資料，主要仍是中國問題的資料。負責人是大西寬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戰前滿鐵所作的調查資料，大部份庋藏於此。

（三）幣原平和會資料室：「幣原外交」是大正末期昭和初年受世界重視的政策，也是二次大戰以前，日本惟

一的標榜「協調」和「容忍」爲對華外交方針，圖使双方關係好轉的時期。幣原一九五一年三月逝世後，友好組成幣原平和會，搜集幣原手寫的備忘錄、函件、演說及公私文獻，負責整理纂輯並編寫幣原的傳記。此項傳記已於一九五五年印行。所收集的資料連同幣原生前所藏圖書刊物會議錄等，皆併歸國會圖書館，設立幣原平和會資料室。幣原喜重郎任駐美大使時，曾以全權出席華盛頓會議。出任外務大臣後，正值中國北伐，並主持日蘇建交。迨二次出任濱口及若槻兩次組閣的外相失敗後，甫半年即爆發九一八事變。故其一生事蹟所留資料，對於研究民國史十分重要。幣原除寫有回憶錄外，有遺稿「戰爭的幽靈」，刊載於中央公論，係分析滿洲事變的根源，極可參考。

第二、屬於東京大學的有東洋文化研究所，屬於早稻田大學的有大隈文書資料室。

(一) 東洋文化研究所：爲東京大學附設綜合研究東洋文化的機構。現分哲學宗教、文學語言、歷史、美術、考古、法律政治、經濟商業，人文地理及文化人類學八部門。所藏圖書戰時已達二十萬冊，自接收日本學士院東亞諸民族調查室的全部圖書，又收藏松本忠雄、長澤規矩也、清野謙次、矢吹慶輝諸氏藏書，庋藏更爲豐富。

研究所所長前爲研究中國法制史的仁井田陞氏，五十四年三月退休後（五十五年六月逝世），由江上波夫繼任現任所長爲小口偉一。研究所延聘專任或兼任學人從事專題研究，並每月舉行研究討論會。目前研究的主要題目，有中國土地制度問題，仁井田陞及西島定生擔任，「現代中國」（中共）的研究，由福島正夫等擔任，福島研究中心共經濟，新近有「人民公社研究」等書出版。印度研究由荒松雄及山崎利男等擔任。

至於該所所訂之共同研究題目，則達十八種之多，其中大半係以中國爲對象，而中國近代史部分更佔重要地位，尤其「現代中國及朝鮮之研究」（主任爲佐伯有一），規模宏大，參加人員幾佔全所之半，足見其研究中國問題風氣之盛。

與筆者研究範圍較近者，爲植田捷雄氏所主持近代中國國際關係的研究，坂野正高、衛藤瀋吉、橋木秀一、川野重任等均參加。五年前曾提出近代資本主義與國際關係對東亞影響的研究，特別注重西方勢力進入中國後所引起種種反應與變化。但旋即感覺此一題目涉及極深極鉅，斷非短時期所可企及，故現仍懸以爲研究標的，而由各人自行研究。研究成果提要均載於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東洋文化研究所又新添有大木與下中兩文庫：

(1) 大木文庫 係大木幹一藏書捐贈予研究所，全部藏書有三千一百六十八部共四萬五千餘冊。此一文庫以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資料，蒐集清代專集文集達數百種之多，爲其特色。

(2) 下中文庫：係下中彌三郎的藏書，捐贈予研究所。藏有戰後出版的中文圖書二千餘冊，雜誌九種計五百餘冊，及有關東亞問題的西文著述一百餘種。此項專收藏二次大戰後有關中國問題出版品的文庫，在日本尙屬創舉。

(二) 大隈文書資料室：大隈重信爲早稻田大學創辦人，於一九二二年逝世後，其遺屬將其全部函札文稿移贈早稻田大學，專設立大隈文書室以爲紀念。此項文書函件約有五千件，文稿約有七千件，多爲未發表者。先後經小林堅三、深谷博治、渡邊幾治郎及中村尚美諸人，從事整理編目選輯工作。現已編印有大隈文書目錄及大隈文書五冊。

一九五〇年早稻田大學並設立大隈研究室，延聘渡邊幾治郎、石川榮雄、深谷博治、塙越菊治、內田繁隆等，從事以大隈生平爲中心，有關東亞各問題的研究，並出版「大隈研究」期刊一種。先後出版七期。

第三、屬於日本官廳的有防衛廳的戰史室及大藏省的財政史編纂室。

(一) 防衛廳戰史室：戰史室的資料即日本前陸海兩省及參謀軍令兩部焚燬殘餘的檔案資料，非經特別許可是不對外公開的，戰史室由西浦進氏主持，另設有戰史編纂官多人。此次角田順主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所印資料編一巨冊，即商得戰史室同意，並由編纂官稻葉正夫參加編輯。有關第二次大戰檔案資料，又繼畠場一雄（前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所編「支那事變戰爭指導史」之後刊布一部份。

(二) 大藏省財政史編纂室：此為編纂昭和財政史所收集的資料。收藏有松方正義、水町袈裟六、勝田主計、松尾臣善、曾荒彌助及日賀田種太郎六家文書。松方為日本元老之一，歷任藏相首相，並與清末民初貸款漢治萍公司關係頗深。勝田大正初歷任大藏省次官，寺內內閣出任藏相，主持對華西原借款。曾荒任藏相外並曾擔任韓國統監。水町及松尾等曾任日本銀行總裁。此六家文書對研究中國近代財政經濟史，關係頗多。

## (二) 日本研究中日外交史的趨向

至於日本學術界從事中日關係研究，戰後曾一度沉寂，近二十年又十分蓬勃。就以記述這次中日戰爭歷史來說，有系統的編述就有八九種之多。從根據戰地新聞報導為主要資料，所編的「秘錄大東亞戰史」起，先後編印的有外務省的「終戰史錄」，外交協會編的「太平洋戰爭原因論」，「太平洋戰爭終結論」。歷史學研究會編的「太平洋戰爭史」，服部卓四郎（前參謀部作戰參謀）編的「大東亞戰爭全史」，讀賣新聞編「終戰史」，新近又有前參謀部作戰課長畠場一雄，根據當時作戰計劃編成「支那事變戰爭指導史」，及角田順民主編，以外務省防衛廳檔案為根據編選的「太平洋戰爭への道」。並陸續編印現代史資料分「滿洲事變」二冊「日中戰爭」五冊等大量刊布有關史料其餘如當時有關軍政人士的回憶錄、傳記、文集以及關於某人某事分析研究的著作，更多不勝舉。

日本研究中日關係的學人，按照一種爲日本學術界默認的分法，分爲戰前派、戰中派及戰後派。戰前派大致年歲多接近或超過六十的，在戰前已有相當學術地位，這些人當時的著作，大部份受那個時代的影響，有意或無意會被軍閥侵略所利用。只有極少部份在當時表現特立獨行的精神，如矢內原忠雄、羽仁五郎、馬場恒吾等人，曾受軍部壓制禁止發表著作的。這一派經過二次大戰沉重的打擊，其初多不願重談戰前的中日關係，偶有文章發表，也是澈底檢討日本所以失敗的關鍵和原因。但由於不免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對於陷日本悲劇命運的軍政當局，似不無寄以深厚的諒解與同情。

所謂戰中派，大概都是四十五到五十出頭的年紀，是在二次大戰中思想漸成熟的一羣，這些人身臨過戰場，所以較能覺悟，研究中國問題也比較客觀。他們普遍體驗到對中國認識的不够，研究工作很勤奮，範圍亦很廣泛，幾乎對若干戰前中日關鍵的大問題，都嘗試作有系統的整理和研究。日本國際政治學會所出版外交研究季刊，有明治時期、大正時期，昭和時期，中日關係的展開，日清、日露戰爭等專號，集合若干學人，分題撰述，可作爲代表。繼「太平洋戰爭への道」之後，又將集體整理研究大正昭和年間中日各問題，仍由角田順氏主編，朝日新聞社印行，也是這種趨向。

戰後派是比較年富力強的一羣，這些人是戰後接受大學教育，眼看到東亞現階段的形勢，日本戰後的復興，却没有受到戰爭深刻的教訓，在思想上不免漸漸趾高氣揚起來。被日本學界批評爲染有「軍國主義思想復活」的傾向，應該是這派中的一少部份人物。他們常從研究中找理由爲日本辯解，自己原諒自己，嚮往當年日本在中國的地位。隨着歲月的移轉，社會領導階層自然的遞嬗，這派人恐將逐漸在各方面佔得優勢。

當然，這種分法是不能十分嚴格的。

其次要提一下日本研究外交史的學人的派別。日本學界本有派系之分，目前在東京研究外交史的大致可分三派：一派以植田捷雄爲領導，東京大學爲中心，門生子弟散布在各大學或研究機構。如坂野正高、曾村保信、衛藤瀦吉、關寬治及宇野重昭等，都可算這個系統。植田氏研究外交問題較重視國際法的觀點解釋問題，但坂野、曾村各人的研究，則已脫出這種偏重的趨向，更能廣泛深入。

第二派是田中直吉所領導的，以國際政治研究所爲中心，現在研究所專任的有山極晃與藤井昇三，兼任的有石川忠雄和衛藤瀦吉等人。田中所實際主持的國際政治學會，更是各派都參加的研究外交史學界的大結合。

第三派是角田順所領導的，以國會圖書館爲中心，集合若干學人從事集體研究。這兩派的結合都與植田派系以師生關係維繫異趣。但現在日本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人，縱不隸屬於這三派中任何一派，也會感受到這三方面的錯綜關係。在集體研究時，有時兩派也合作，有時也對立，正因爲互相砥礪，互相抨擊，更顯出一種蓬勃的氣象。

此外，早稻田一派，慶應一派是別有特色的。石川忠雄等屬早稻田派，內山正熊等屬慶應派，這兩派都受學校傳統風氣的影響。且各對兩校的創辦人大隈重信和福澤諭吉有深厚的感情，因此涉及這兩人的題目，研究結果或不免發生多少的偏愛。

防衛廳戰史室有戰史編纂官，外務省有若干事務官分在圖書館，文書課或其他課局，也從事中日關係的研究。其中屬外務省亞細亞局中國課的調查班十數人，多係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畢業，專作最近中國問題的研究。文書課外交文書編纂室亦有十數人，編纂工作外，也從事戰前中日外交關係的研究，這都值得重視。

就研究的細目來說，據作者所涉及的範圍來分：

- (1) 中日關係：有栗原健、曾村保信、藤井昇三、池田優等。
- (2) 國共關係：有衛藤藩吉、宇野重昭、山極晃、石川忠雄等。
- (3) 二十一條：有內山正熊、崛川武夫、白井勝美、細谷千博等。
- (4) 大隈重信對華關係：有渡邊幾治郎、深谷博治、中村尙美等。
- (5) 西原借款：有波多野善大、石井金一郎、北村敬直、里井彥七郎等。
- (6) 華盛頓會議及裁軍會議：有小林龍夫、大畑篤四郎等。
- (7) 田中義一對華關係：有中村菊雄、稻生典太郎等。
- (8) 滿蒙問題：有白井勝美、小林幸男、關寬治等。
- (9) 日俄問題：有細谷千博、森克巳等。
- (10) 第二次中日戰爭：有島田俊彦、秦郁彥、大山梓等。

都是中年或更年青的一些學人，至於爲作者所不知及不曾接觸的自然百倍於此。

日本研究外交史的新趨向，約有三點是作者體驗到的：第一、對於中國問題的研究，經過二次大戰的教訓，比較能客觀深刻的從事研究。對日本戰前在中國種種行爲，並不諱言，批判也相當客觀。第二、因爲資料的公開，能作細密深入的研究，故綜合某一時期或某一交涉案件，多採用集體力量。第三、社會科學廣泛的採用，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統計學等，都引用到歷史研究的課題。

但是在與日本學人的接觸中，尤其是一個飽受日本侵略痛苦的中國人所體驗，日本學人對於中國問題，時刻流露出矛盾的情緒，他們懷念在中國享受半世紀的權利，也彷彿仍認爲那種權利是日本立國所必需的。但他們也不否